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

【编者按】根据有关“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要求，我们组织专家撰写了有关系列专题论文或笔谈。我们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阐释体系，确是目前学术界需要解决的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学术课题，值得我们下大力去做，并必须把它做好。盖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近 70 年、改革开放也已经 40 年的今天，中国的学界确实自觉地进行一系列系统的学术体系构建工作了。为何要进行这种构建？是因为我们从前追随他人较多，其间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也表现出不同程度地与中国的实际不符合以至于背离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长期生存和发展，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这个“自己的”就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特色之处。当然，这个“自己的”特色，绝不是闭关自守，而是把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结合、以我为主海纳百川而形成的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需要的新时代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我们组织系列专题论文或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

左 玉 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质。它顺应时代发展并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智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实际，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注重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同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立足中国现实而继承中国史学传统，顺应时代发展而着力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也是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根本保障。

一 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导向，现实需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进步的推动力

历史研究无法脱离特定的时代。时代所产生的许多新问题，迫切需要历史学家予以回应并提供历史借鉴。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3 页）倾听时代的呼声，回应时代问题，满足时代需求，是史学发展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拓展与史学理论的更新，是满足时代需要而对重大时代问题所作回应的结果。生态环境的恶化，需要历史学家提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借鉴，直接促进了当代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全球化的时代需要用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人类历史，不仅导致了全球史观的流行，而且促发了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心态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影视史学、微观史学、情感史学等，都是回应时代需求而兴起的。21 世纪以来，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爆炸、能源危机、霸权主义等问题，成为困扰人类的重大时代性问题。解决这些时代问题，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历史借鉴，由此催生了生态史、环境史、人口史、疾病史、医疗史等新兴史学学科的兴起。因此，历史研究新领域、新方法和新理论的更新，归根结底是回应时代问题和满足时代需求的结果。新的研究领域是适应时代需求而开拓出来的；新的研究视角是依据时代的需求而重新审视的结果；新的研究理论是适应时代需求而创新出来的；新的研究方法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尝试出来的。

历史研究无法脱离特定的时代，更无法离开特定的现实社会而存在。史学发展与现实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现实社会的需求是史学发展的推动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强调史学与时代的密切关联，而且关注史学与现实的密切关联，强调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恩格斯研究日耳曼人历史并撰写《马尔克》后解释说：“这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

把它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他‘有教养者’。”他明确申明自己研究历史问题是为了解决当时德国的现实问题,以历史经验指导现实的社会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承了经典作家研究历史的传统,强调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着力解决中国面临的时代和现实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初,就注重回应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翦伯赞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而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46年版,出版地不详,第3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己任。大革命失败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在国内外引起激烈的争论。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要深入研究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因为现实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了解古代社会性质是认清近代社会性质的前提,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为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历史借鉴。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同样是回应中国现实问题而展开的,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直面社会现实的时代性品质。

回应和满足中国现实和时代的需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推动力。从史学研究选题的设定、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视角的转化,都与中国特定时代和现实的需求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了重建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为参照的新的分析框架的要求,故出现了从现代化角度理解和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趋向,并形成了现代化范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要求史学界关注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问题并提供历史借鉴,从而兴起了研究中国西部开发史的热潮;“九八”长江大水引起的新一轮治水高潮,要求史学界担当起研究中外历史上水患及其治理的责任,从而掀起了水利史研究热潮;“非典”的袭击引发了人们对医疗卫生问题的关注,瘟疫史、疾病史、公共卫生史研究随之兴起。中国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催生了史学界对环境史、生态史的研究。日益凸现的边疆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腐败问题,同样引发了中国边疆史、宗教史、民族史、反贪史的研究。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的凸现,引发了中国海洋史、东亚关系史、朝贡体制史及琉球史的研究。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引起了中国学者对中日关系史、南京大屠杀史及中日共同历史认识问题的研究。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同样需要历史学界给予学理支撑并作出积极回应,由此带动了古代中国与中亚关系史、丝绸之路史的研究。至于因现实需要而催生的历史研究课题,则更是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历史研究在回应现实问题中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在关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不断形成连绵不断的研究热点。现实需要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历史研究课题无限多样性;社会问题的凸现及迫切的现实需求,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推动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树常青的奥秘就在这里。

在新的历史时代向中国史学界提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大任务之际,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时代性品格,顺应时代发展并回应时代问题,关注中国现实社会的需求,积极回应中国现实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就要求必须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认清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解决世界性的时代问题提供历史智慧、历史借鉴和中国方案。在此基础上,中国史学界应该准确把握国际史学发展潮流,大胆吸收国际史学界优秀的成果,进而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二 悠久的历史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足点, 丰富的民族史学遗产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资源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悠久历史,有着三千年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注重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自觉把握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探寻其规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突出特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对中国史学遗产采取了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注重对优秀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

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原则,对中国史学遗产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自觉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求真”与“致用”的双重特性,表明它继承并延续了中国的史学传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新的历史时代向中国学界提出了创建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大任务。而要真正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体系,必须高度重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将根基建立在深厚的民族史学传统之上。换言之,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是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根本立足点;丰富的民族史学遗产是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带有民族特性的“中国的”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新形态,不仅其表现形式和语言风格带有民族特色,而且其发展路径和基本特质同样带有中国特色。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数千年来形成的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也能够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中国史学有注重“通古今之变”的传统,有注重“成一家之言”的传统,有注重考究历史发展“大势”的传统,有注重史家“才学识”三长和史德修养的传统,有以史为鉴的资治传统,有注重多样化编纂史书的传统,这些都需要加以继承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求真”与“致用”的双重特性,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史学所强调的秉笔直书的独立个性、实事求是的信史原则和经世致用的资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仅仅注重继承中国史学遗产还是不够的,必须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方法,对其作出马克思主义新阐释,以促成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立足于新时代丰富的史学实践,大胆创新,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才能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但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史学传统,旨在创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而不是回归传统,更不是盲目排外。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必须将中国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来自各时代各方面的优秀元素。

三 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

继承中国史学传统并回应时代问题是创建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客观要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鲜明的双重品质:时代性和民族性。一方面,它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现实,顺应时代发展并关注时代需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它回应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以中国面临的问题引领中国史学研究方向,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借鉴和历史智慧,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它扎根于悠久的中国史学传统,继承并发扬丰富的民族史学遗产,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当代形态,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性品质,要求中国史家不能故步自封,要有开放的国际视野,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积极回应全球性的时代问题,认清世界史学发展的潮流,跟上国际史学发展的步伐,不断拓展史学研究领域,大胆借鉴国际史学界可行的研究理论方法,积极吸收国际学界优秀的史学成果,自觉地建构有民族特色并符合时代趋势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进而引领国际史学发展潮流。

吸收国际史学成果绝不意味着照搬照抄西方史学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强调时代性的同时还强调民族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性品质,要求中国史家绝不能照搬

照抄西方史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实际,继承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吸收优秀的民族史学遗产,将中国史学传统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牢固地建立在中国民族史学的根基上,在丰富的史学研究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概念和中国命题,并用这些概念和命题建构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从而使其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它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并从丰富的民族史学遗产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同时又高度关注时代发展和时代问题,积极回应和解决时代问题,尤其关注并着力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从而将民族性与时代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也是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客观要求。换言之,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这就要求必须在强调民族性的基础上注重时代性,必须在回应时代问题时注重民族特性。以民族性为基点,以时代性为主题,用民族性关照时代性,用时代性丰富民族性。在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中,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时代问题和现实需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的推动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能忘记自己根本的民族立场,也不能逃避现实社会责任,而要继承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勇敢地回应时代和现实提出的挑战,将继承中国史学传统与满足时代需求结合起来,将保持民族特性与回应时代问题结合起来,将吸收民族史学遗产与借鉴国际史学成果结合起来,自觉地创建具有民族特色而符合时代潮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总之,新时代需要创建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这项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必须做到民族特色与时代内涵的高度统一。当代中国所要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是带有民族特色的史学体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本土的,也是时代的、国际的和前沿的;它是能够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国际史学相对话的中国史学体系,它是适应时代需求、回应时代问题而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史全视角下的‘中国特色’问题研究”(2016MZD007)。

收稿日期 2018-04-23

作者左玉河,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方法的内外互补:“中国史”学界的中国与西方

李金铮

近代以来,中国几乎任何领域都笼罩着中西关系的问题。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益激烈起来。以学术界而言,主要就是中国大陆学者如何面对西方的“中国学”以及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在史学领域则是如何看待和认识西方的“中国史”学和中国本土的“中国史”学。所谓“中国史”学界,并非专指中国史学界,而是整个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界,其中也包括西方学者。所谓西方,指欧美国家和地区,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国家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西方学术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形态,关于中国史的研究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之所以拿此阐论,不过因为我是历史学者,再具体一点主要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本文更多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谈谈我对“中国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中西学者研究之关系,也为目前中西学术问题提供一个侧面的认识。

一 渴望学术“翻身”与排外情绪

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近些年之所以对西方进行“大面积”的评说,与其说是因为西方发生